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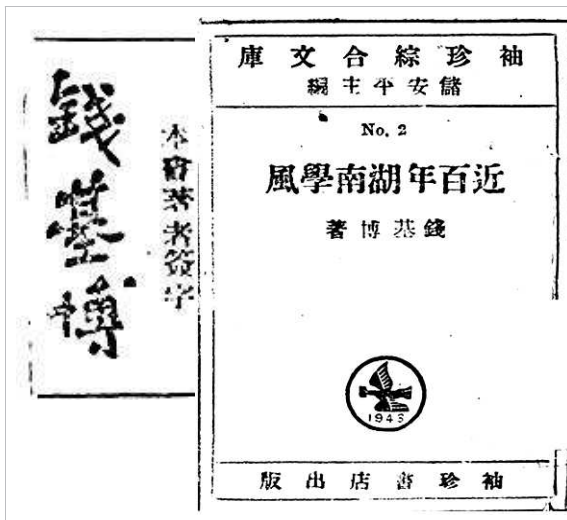
储安平与《近百年湖南学风》

■ 尧育飞

1943年，钱基博（字子泉，1887-1957）担任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在湖南安化蓝田的深山中，钱基博写下地域文化研究名著《近百年湖南学风》。该书从1840年前后写起，重点记载汤鹏、魏源、罗泽南等17位湘籍人士的光辉事迹。是书的缘起，与钱基博亲身感受湖南土地刚强、民性倔强的风俗不无关系，而他所褒扬的“学风”，与今日所言者区别较大，他所言的乃是湘湖俊杰在乱世中的卓言异行及其处变不惊和从容镇定的精神风范。

此期，正在国立蓝田师院政治系任教的储安平（1909-1966）偕妻子端木露西开办了袖珍书店，兼营出版业务。1943年6月，《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被储安平纳入其主编的《袖珍综合文库》出版，《文库》还包括陈之迈《最近五十年之中国政治》、吴稚晖《四十年前之小故事》、谢贻徵《纵横谈欧洲》及端木露西《海外小笺》。该书版权页云：“《近百年湖南学风》，定价每册五元（外埠酌加邮运费）。著者：钱基博。发行人：储安平。发行所：袖珍书店（湖南蓝田光明山）。印刷者：启明印刷局（湖南蓝田）。民国卅二年六月二十日湘一版。有著作权，不准翻印。”战时的湘中，僻处一隅，出版气象并不乐观。

为扩大销量，储安平想了许多办法。他设计了长长的广告语印在醒目的书首：



博手书签名
一九四三年版《近百年湖南学风》及钱基



一九四四年求知书店版《近百年湖南学风》
“发挥湖南人的精神，完成大时代之胜利。”

无锡钱子泉先生，早负文名，海内传诵，综合文史，尤能独具只眼，自名一家。来湘五载，读湘贤书逾二千卷，兹应本店之请，出其余绪，为《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表彰乡贤，以砺士习。本集先论汤鹏等八人，后集续论刘蓉、郭嵩焘、王闿运、阎镇珩、邹代钧、罗正钧、谭嗣同、蔡锷及章士钊等九人。近百年来湖南之文学、武功、军事、外交、政治各方面人才，俱全本书。钱先生论湘贤，不重事功之叙述，重性格之剖解；研究其学问道德之如何涵养，事业文章至如何成功。取精用宏，弥为珍贵，得此一卷，不啻读湘贤书千卷。

这则图书广告先从钱基博的学问和文名人手，接着点明钱基博著书的学术储备——“读湘贤

书逾二千卷”。以钱基博的阅读量为言，这一数据可能并非储安平的夸饰。紧接着将《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学术旨趣简要概括而出。读者读此一卷，不啻经由钱基博之眼而得以领略近百年湖南先贤的事业文章和学问道德。其言下之意，当然是此书颇值购买了。这广告可谓《近百年湖南学风》的提炼提要，很能引起读者购书的热情。

但储安平的策略不止于此。他别出心裁地让每一册书都变成“签名本”，即在广告下头特别印制作者手书“钱基博”三字。一并地，储安平将自己的主编头衔也印得十分醒目，云“袖珍综合文库储安平主编 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前中央日报社社主笔”。不幸的

是，此书虽经储安平如此精心设计，且广受各界好评，但图书的销售额并不高。原因呢？一则定价太低，关于其价格，曾有人回忆云，“一本大约等于一碗阳春面”（俞润泉《旧籍重光》，见《读书》1987年第四期第一〇七页）；外加储安平出书心切，薄薄一册居然分前后两集出版，且前后集印数不等。

受时局所限，储安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破解销售困境。他只能在书末发布《征求注册读者》的启示，吐露心扉，试图打动读者。该启示云：

我们的书定价都很低，目的要想减轻读者负担，使大家都能购买，但邮资一再加价，邮费虽低，而写信所费的邮票，负担仍重，因此我们决定举行“注册读

者”的购法，藉以减轻读者的邮费负担。手续十分简单，帐款绝对保证，长期办理，随时可以加入，请阅书内所附说明。

这种会员制的预购模式并不新鲜，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更难以实施。而且，读者若参加这个活动，竟然还得再去书内查阅说明，可见实际手续并不简单。更要命的是，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上集的书末，赫然又印了这么几行字：“□□注册读者办法，本书因篇幅不敷，不克附刊，请阅其他数书所附说明。”可见，征求注册读者这套办法并未有效执行，基本宣告失败。

销售策略混乱，销量自然难以保障。因此，《袖珍综合文库》第一批书出版之后，就不见下文了。

1944年，在湖南安化桥头河开设求知书店的龙良臣选择重印《近百年湖南学风》，他仅做了两项改变，就使此书销量大为改观。第一，将前后二集合并，使是书得以完整；第二，把长长的售书广告和繁琐的《征求注册读者》悉数删除，仅在封面留下两行字——“发挥湖南人的精神，完成大时代之胜利”。龙良臣此举大获成功，如今存世的民国本《近百年湖南学风》，多为此版本。

图书销售有学问，但此中学问并不全在广告上，观储安平出版《近百年湖南学风》可知一二。彼时的储安平发行书籍并不成功，他在出版行业大放异彩，要待几年之后创办《观察》杂志之际。

（上接第二版）就这样，三年之后《赵氏孤儿》在欧洲“粉墨登场”，与欧洲读者见了面，开启了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史。

杜赫德对收入《赵氏孤儿》的确是没有任何准备的，否则考虑到中国戏剧足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他不会在这套书出版前接受预订的广告中对此一言不发的。杜赫德在没有取得马若瑟或福尔蒙同意的情况下，把译文收入到了《中华帝国全志》确实有偏失之处。但如果考虑到《赵氏孤儿》并不是《中华帝国全志》中第一次收录的马若瑟稿件（法国汉学家蓝莉确定至少有60篇，除了《赵氏孤儿》还有八篇《诗经》译文）。在某种意义上，杜赫德擅做主张是建立在他与马若瑟早已建立通信关系基础上的因循常例。公允的说，杜赫德做了一件改变中国翻译史的好事。马若瑟到后来才明白，福尔蒙原来自己也有一本他的汉语语法书有待出版，自己的书早已经被束之高阁了，在他看来《赵氏孤儿》虽与《语法札记》相比无足轻重，但想要出版也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即便出版，我们今天看到的也许就是福尔蒙的署名了。

300年前的“急就章” 现读来依然准确独到

马若瑟在给福尔蒙的信里面讲自己的译文是一篇“急就章”（fort à la hate et corrente calamo），然而公允地说，现在回看马若瑟近三百前的翻译，其译文依然不失准确精到，戏曲第一折有一幕，公主见她的丈夫、驸马赵朔已经被“三搬朝

殿”赐死，自己怀上了“赵氏孤儿”，屠岸贾还却不肯放过她们母子，还要赶尽杀绝，心情之沉重不言而喻，于是再次上场的时候就以诗的形式这样说道：“天下人烦恼，都在我心头。犹如秋夜雨，一点一滴愁。”马若瑟的译文是：“Il me semble que les maux de tous les hommes sont renfermez dans mon cœur”。用汉语回译是这样的：“似乎所有人的痛苦都被藏在我心里”。“烦恼”两字被马若瑟转换为“痛苦”。试想，公主的处境险象环生，有失子之虞，又岂止“烦恼”二字？中国戏曲语言含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决定原作者纪君祥不以“痛苦”之意直抒，但是翻译到法文，这种含蓄的字眼直译所产生的效果就未必尽如人意。马若瑟很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对此理解分毫不差，同时也将自己正确的理解反映到了译文之中，颇有点译透纸背之力。至于后面那句，纪君祥把愁思比作雨丝绵绵，马若瑟很可能认为这样寓情寓景的话语于读者理解剧情无益，他也无法在译文中重建隐喻关系，即便译出，跳脱到“雨”反倒会成为阅读的负累，也就索性略去不译了。

如果必说这篇《赵氏孤儿》有缺憾，那就是这部剧中用来唱的曲词部分没有完全翻译出来。杂剧的曲词本是宋词衍发而来，再加上曲调的平仄规律，比词难工。可以料想，唱词对于外国人而言理解起来不简单，但马若瑟的汉语水平既然超群，又如何没有翻译曲词？曲词重在抒情，如若翻译成法文，即便意思清晰明了，也难免造成整部戏剧展开的节奏停滞。也就是说，抒情一多，必损戏剧的情节。《赵氏孤

儿》以悬念取胜，马若瑟的翻译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故事为中心的，所以他只翻译了类似于当今话剧的对话部分的宾白，对于抒情为主的曲词没有翻译，亦是情有可原的。再加上《赵氏孤儿》的宾白本就比一般其他的元杂剧要多，曲词就算不翻译出来，译文也可取得完整的意思，自成一统。其实，凡是仔细校对过译文的人都可以发现，马若瑟对曲词也不是完全不著一词的，一些跟剧情有粘连部分的唱词还是被他翻译了出来。如公孙杵臼在自己的家里，等着屠岸贾来问罪，就有这样一句：

原文：

【双调】【新水令】我则见荡征尘飞过小溪桥，多管是损忠良贼徒来到。齐臻臻摆着士卒，明晃晃列着枪刀。眼见的我死在今朝，更避甚痛答掠。

马若瑟译文：

(Il chante.)Quelle poussière s'élève? Quelle troupe de soldats vois-je arriver? C'est sans doute le voleur; il faut me résoudre à mourir.

笔者回译：

（他唱）为什么尘埃扬起来了？我看到的那群士兵，是干什么的？可能来的是一群强盗；我该下定决心赴死了。

纪君祥由景及“我”：公孙杵臼看到奸恶之人来到，远道处扬尘起灰，兵士刀枪已现，自己凶多吉少。细看马若瑟的译文，他首先以“我唱”起头，其功能上大致与杂剧的曲牌名相似，告诉读者下面的话有别于一般的对话，是角色唱出来的。

翻译的时候，他不舍“尘”的意象这一细微之处，把“我”的叙述更深深地拓展开来，译文连用两个反映心中思忖的问句来对应原文中直陈语气的唱词，反映了公孙杵臼从不安到坚定的心理变化，译文读起来比杂剧显得更富有心理波折。于是，公孙杵臼沉着冷静的形象中平添了一丝内心的波澜，译文仿佛走入了人物的内心一般，读来颇有西方戏剧之感。此处可见译者的翻译多少还是要受到目标语本身的文学范式特点的影响，戏剧翻译也不逸出其外。

马若瑟曾担心自己译文不当会遮蔽《赵氏孤儿》，在写给福尔蒙的信中他说到：“我希望，这些（笔者注：指翻译的风格与语句结构）都不会阻碍您感受到充满在这篇作品的中的美与伟大的情感”。《赵氏孤儿》的翻译尽管也并非无可挑剔，但其戏曲翻译尝试的精神却十分可贵，是译史上的一座丰碑，马若瑟也因而成为中西戏剧交流史上最早的摆渡之人。大文豪伏尔泰在他根据《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的《献词》（Epître）中就这样评价这篇译文：“《赵氏孤儿》是一部珍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胜过人们已经做过的以及将来要做的关于这个大帝国所有之陈述。”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代，《赵氏孤儿》在西方首次彰显了中国人与黑暗势力坚决斗争，为正义事业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第一次在海外奏出了中国人的强音。

（本期封面：大文豪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为新剧本《中国孤儿》，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手绘制图：王梓含）